

# 追忆吴老

## 刘增羽

(1930~)，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原办公室主任。

世界知名植物学家、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征镒老先生，于2013年6月20日凌晨1时31分驾鹤西去，享年九十七岁。我1981年采访吴老时，他亲口告诉我，他要争取活到八十岁。他的这个“奋斗目标”，之后做过两次修改，“活到一百岁”，“活到一百二十岁”。最终，他活到九十七岁。但无论是按照中国标准，还是国际标准，九十七岁都应该是“高寿”了。

吴老离世的消息，对我来说，来得并不突然。2013年初，我去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看门诊，曾想去该医院的干部病房看望长期住院治疗的吴老。昆明植物所有人告诉我，目前吴老的病情严重，已不认识人了；除护工外，所里另外还派有四位年轻人轮班在病房守护。鉴于吴老的病情，我就没有去病房看望他。

我最佩服也比较熟悉的两位院士（施立明、吴征镒），我都未能在他们头脑尚保持清醒时与他们作最后的交流。1994年，我与中科院昆明分院党组副书记张家和同志到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ICU病房去看望施立明时，他已经昏迷不醒。这次本想去看望吴老，但听说他已不认识人，也就没有去。真遗憾！

我得知“吴老去世”的消息也很迅速。中国科学院的官方微博是6月20日16时44分发布这个消息的；我却是在七个小时前（即当天早晨，昆明植物所的人刚上班）从昆明植物所一位友人给我来的一个电话里，得知吴老去世的消息。

1978年，国务院批准新组建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它的首任院长兼党组书记刘希玲同志刚上任不久，就因罹患癌症，不幸去世。1980年，中国科学院任命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吴征镒兼任中科院昆明分院院长，直至1984年离任。

吴老兼任昆明分院的院长期间，我担任分院办公室副主任，和吴老曾有过一些接触。今天，提起吴老，我不禁回忆起一些往事：有些是工作方面的，有些则是生活小镜头。

### 吴老两次发话，留我在中科院昆明分院工作

我爱人沈定华因为受我“右派”问题牵连，于1957年12月被下放到禄劝县当小学教员。1979年初，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共青团云南省委为我落实政策（右派改正），省委组织部分配我到中科院昆明分院工作。此时，我的儿女均已到外地上学。沈定华做了“子宫次全切除”手术，却一人留在禄劝，生活无人照顾，很不方便。我申请把沈定华调回昆明，分院主管领导却不同意。我不得不另觅单位。昆明师范学院党委同意接收我和沈定华，安排我到外语系当老师，沈定华到师院图书馆工作。正当我准备前往昆明师院报到时，分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鲜春同志去请示院长吴征镒。院长却不同意我走；分院人事处只好往禄劝县委组织部发调令，把沈定华调回昆明。

1983年，我在分院计划处工作，经常外出参加中科院召开的一些全院性专业会议。那个时候，与会人员的住房、坐车，均与职称挂钩；我虽然是1950年毕业的大学生，职称却是个“白板”，因



此会议期间我的生活待遇还不如一个助理研究员（当时，1958年毕业于的大学生，不少人的职称已是副研究员），我颇有微词。不久，中共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打算调我去该室工作，省委组织部打电话正式征求分院党组书记鲜春同志的意见。老鲜不便作主，就去向吴院长请示。吴老又不同意放我走，理由是，分院办公室需要一个既能搞中文，又能搞英文的人。

吴老明白，我想调走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职称”，而政策研究室当时不讲职称，只认职务。正在此时，院部刚刚把副高级职称的审批权下放到分院，吴老当即决定：给我评定职称。走完过场后，吴院长亲笔签署，赏给我一个“副研究员”。

我是文科出身，在国家级自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只能算是“非主系列”，只有资格从事一些行政事务性的工作。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这个“副研”究竟在“研”什么。

### 吴老做科学研究时聚精会神，却在分院办公会议上打瞌睡

分院属于行政领导机关，每周都要开一次办公会议。按照常规，吴老作为昆明分院的院长，理应出席并主持分院办公会议。

但是，分院开办公会议时，吴老却经常缺席。分院的许多事情，又不能不请他点头。怎么办？只得由鲜春（分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戴禧融（分院办公室主任）和我（办公室副主任、机关办公会议担任记录），三人一起前往昆明植物所，向吴老当面汇报，并听取他的意见。

有些重要议题，必须由吴院长亲自到场参加讨论，才可以拍板定案。于是，分院派出专车去黑龙潭，把吴老接到护国路（分院原办公处）。他一进到分院的小会议室，往一个双人沙发上一坐，办公会议才正式开始。这个长沙发是会议主持人的专用座位，面向双扇门，背靠玻璃窗；按惯例，非会议主持人是绝对不敢去坐的。刚开始，吴老还在聆听与会者的发言；可是不久，他就发出微弱鼾声，睡着了。与会者没有谁愿意，或者敢于去唤醒吴老。大家继续发言。十一点过，会议接近尾声时，他终于醒来了。副院长、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扼要向他汇报此次办公会议的讨论结果。他基本上都是“点头同意”，极少有不同意见。

我担任分院办公会议记录，坐得离吴老的“主席专用座位”比较近。他一醒来，就要向我索要一支香烟，抽抽烟，提提神。

吴老在植物标本馆、在他的所长办公室、在野外考察中，一向是聚精会神；还没听说吴老在工作时间内打瞌睡。看来，他对分院那些例行公事的、大大小小的事务性工作，并不关心，也不感兴趣；可能还会认为那是浪费他的宝贵时间。

### 吴老是个老资格的京戏迷

在昆明植物所，在分院，吴老都是“头号领导”。可是，在他的家里，他也不能例外，是个“被领导”。和一般常人一样，在家里他也得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八十年代初期，昆明植物所搞基建，不断有拉沙的大卡车出入，沙子常常从卡车车厢缝隙漏到路面上。有一天，吴老提着两个八磅热水瓶，从他家住处前往开水锅炉房灌装开水。他走到路上，一不小心，就被路面上散落的沙子滑倒在地，造成骨折，不得不送往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

分院领导鲜春同志叮嘱我，抽空要去医院看看吴老。我就骑车去到附一院。

我是来探视病人的，按理说，应该就病情与患者进行交流沟通，表达慰问之意。可是，一进入

他的单人病房，他劈头劈脑就和我谈论起京剧来了。他说，他知道我喜欢京剧（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知我喜欢京剧）。他问我，喜欢哪个行当？我说，喜欢老生。他又问我，喜欢哪些京剧演员？我们兴高采烈地谈论起京剧老生名家余叔岩、言菊朋、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我们的整个谈话，就没有一句涉及他的骨折。临别时，他给我布置任务：复制几盒马连良的唱腔录音带，尽快给他送去，便于他在病房里消磨时间。这时我才明白，吴老是个京剧迷。

2006年，我应中科院昆明分院党组之邀，出任我们分院系统老干部画册《金色记忆》一书的执行主编。吴老作为昆明植物所名誉所长、中科院资深院士、老研究员，1949年以前即已参加革命，自然人选这本画册。

昆明植物研究所送来的、有关吴老的生活照片中，有一张是吴老吹笛子的照片。图片说明是：“吴老在贵州梵净山考察时，在山脚一家出售笛子的商店购笛时调音、试吹。”

横笛是昆曲的主要伴奏乐器。昆曲又是戏曲艺术的高级形式。京剧表演艺术家、著名小生俞振飞先生，同时又是昆曲大师。梅兰芳、言慧珠等多位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擅长昆曲艺术。我在想，难道吴老也会昆曲？一打听，果不其然。吴老不仅会唱京剧，还会唱昆曲；他也能用笛子为昆曲唱腔伴奏。他和许多中国老知识分子、老科学家一样，是“文理兼通”的能手和多面手。

### 我采写吴老，心灵感到震撼

1981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胡克实同志来云南视察工作。胡克实同志还有一个附带任务，就是要为他分管的《科学报》物色一名驻云南的兼职记者。中科院昆明分院秘书长萧隽琴同志向胡克实同志推荐，说“昆明分院办公室副主任刘增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担任《西南青年》杂志记者、《云南青年报》副总编辑，是个现成人选。”胡克实副院长一听，就拍板定案；于是，我开始兼任《科学报》驻云南兼职记者。

不久，中科院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全院新闻报道工作会议。我作为中科院昆明分院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

会议结束时，《科学报》编辑部给我布置的唯一的一项任务，就是采写吴征镒。

我是文科出身，学的是英国文学，对自然科学（数、理、化、天、地、生）研究，可说是百分之百的外行，“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采写自然科学家，就极有可能隔靴搔痒，甚至出大洋相。为了采写这篇文章，我曾努力学习过少量有关植物分类区系地理最浅显的基础性知识；我还拜读了吴老有关“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那篇著名的学术论文。定稿过程中，在送给吴老本人审阅之前，我还专程请教过昆明植物所的植物分类学专家李锡文、陈介、臧穆等几位教授。过去，我也曾为一些报刊写过一些报道和评论，但从未产生过像这次写吴老的那种紧张不安情绪，真可谓胆颤心惊。

写吴老，我感到震撼、难以忘却的“镜头”之一，是吴老在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在科研岗位上为我们祖国所做出的一项特殊贡献。我写道：“1951年，朝鲜战火正烈，我国东北地区飞来了几片树叶。‘我们国家没有这种树叶啊！只有北美洲才有这种植物。’有一位植物学家在思索。一查，不出所料，这正是美国搞细菌战使用的树叶。周总理表扬了这位锐敏的植物学家。……”

这里写的那位“锐敏的植物学家”，就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的吴征镒。

在中国众多的植物学家当中，吴征镒发现并命名的植物最多，因而被国际植物学界赞誉为“中



国植物的活字典”。

我曾写过三位中国知名科学家：一是吴征镒，二是彭加木，三是蔡希陶。其中，以写吴征镒的文章篇数最多。我写吴老的文章，共有四篇：（1）《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的吴征镒》（载《科学报》第412期）。（2）《吴征镒教授谈开发大西南》（载《科学报》第577期）。（3）《世界植物发源地在哪里？——记植物学家吴征镒的学术思想》（载《云南科技报》1982年元旦特刊）。

（4）《关于“大师获大奖”的联想》（2008年1月在昆明植物所网站刊登）。如果加上这篇《追忆吴老》，总数就应该是五篇了。

写彭加木的文章，共有两篇：（1）《营救彭加木同志纪实》（在1981年10月29日《科学报》刊登）；（2）《彭加木，你在哪里？》（原载我编著的《瀚森文存》和《似水流年》）。写蔡希陶的文章，也有两篇：（1）蔡希陶同志追悼会《悼词》（为云南省副省长兼省科委主任马文东同志起草的《悼词》草稿）；（2）《愿生命之树常绿——缅怀蔡希陶同志》（以云南省科委、云南省科协、中科院昆明分院三家单位的名义起草的追思文章，载《蔡希陶纪念文集》第7-9页）。

### 我给吴老的家属捎去一张字条，表示悼念

我事先就知道为吴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时间、地点和规格。但我没有去到殡仪馆为吴老送行。

其一，两千余人参加的遗体告别仪式，从头到尾，时间肯定不会短。我因患腰椎管狭窄症，不能久站。担心我无法坚持到最后。

其二，中央政治局的现任七位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曾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朱镕基、温家宝等，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延东、汪洋、赵乐际等，中共中央组织部都送来了花圈，云南省党政领导秦光荣、李纪恒、仇和等亲自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告别大厅内摆不下，不少花圈都摆放在外面。但是，仪式一结束，这些花圈不是烧掉，就是将白色挽带取下，换个名字又拿去悼念别人。我想，我倒不如写张字条，还可向吴老的家属表达我的悼念之意。

但是，为吴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前一天（2013年6月25日），我曾专程去到昆明植物所在办公楼三楼为吴老设立的灵堂，清清静静、恭恭敬敬地在吴老遗像面前，对他行了三个鞠躬礼。

在灵堂，我将我写的一张纸条，托当时正在现场的吕春朝同志转交给吴老的家属。我在纸条上写道：“植物分类区系和植物地理学的世界级专家，中国植物的‘活字典’，超级才子和多面手，一家四弟兄出了二位院士的吴征镒老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